

● 唐力行 / 著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 社会经济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 社会经济研究

● 唐力行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唐力行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8

ISBN 7-81052-264-7

I. 明… II. 唐… III. 地方史-研究-安徽-明清时代
IV. 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701 号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唐力行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开 本	850×1168 1/32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印 张	11.7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 数	300 千
责任编辑	王先斌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鲁 榕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数	0001-1000

ISBN7-81052-264-7/K·23

定价 2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无梦到徽州(代序)

徽州是我心中的一片圣地。或许借用标题所引汤显祖的诗句,才能最为贴切地表达我与徽州的一份情感。当我第一次踏进古老的徽州,扑面而来的便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气息: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狭窄幽深的巷子里,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不知尽头,似乎与我的故乡苏州相连相通。正是从这青石板路开始,徽商“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告别亲人,跋山涉水,走向“无徽不成镇”的江南,走向苏州、武汉、北京、佛山等等南北东西中的商业大都会,走向“山陬海堧,孤村僻壤”,走向世界,以至“足迹几遍宇内”。胡适先生称赞徽商刻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誉之为“徽骆驼”。远眺黄山白岳,我仿佛听到驼铃声回荡于崇岭空谷,悠远而又悲凉;仿佛看到成帮结队的徽骆驼渐行渐远,消失在雾霭沉沉的山间鸟道……徽商“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曲伸”,以其经营活动造成了商业繁荣的局面,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徽商所拥有的资本是惊人的,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百万、千万者,也是同期西欧商人难望项背的。然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商人实现了向早期资本家的转型,中国的商人资本却始终滞留在流通领域。徽商研究无疑为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特有的视角。提起我与徽州学结缘,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洪焕椿教授。那是80年代初,我刚走出“文革”的阴影,调入安徽师范大学工作。在选择专业方向时,我重回母校,求教于先生,先生建议我就近选择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明清徽商作为研究课题,把我指引上了通往徽州学的学术之路。但是徽商研究起步早,知名学者傅衣凌教授以及日本根岸

佶教授、藤井宏教授等早在 30—40 年代便对徽商做了开拓性研究。因此,这一课题的起点高,有相当的难度。我感受到先生要我走的学术之途是艰难的,但惟其艰难,反而激起我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从而与徽州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将近 20 年来,我撰写徽州学论文近 30 篇,它们留下了我在研究徽州学之途艰难跋涉的印痕,也是我敝帚自珍的。这次结集的 21 篇论文,内容大抵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徽州人物。其实将它们这样划分也是十分勉强的,徽州社会是一个整体,宗族、商人、文化、社会、人物都是你中有我不可分割的,只是每篇文章各有侧重罢了。关于文章的内容无须我再赘述,这里仅想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谈谈对徽州学的一点看法。我认为徽州学是以徽州区域社会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以下我想分别就徽州学的研究价值、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略陈浅见。这些见解虽是就徽州学而言的,但对方兴未艾的区域史研究或许有借鉴意义。

徽州学的研究价值:

1. 徽州学研究的路径与传统史学不同。徽州学从以政治史和王朝体系为中心的传统史学领域中跳了出来,它是通过解剖中国社会的某一局部去认识整体中国的。著名学者王毓铨教授早在 1983 年 11 月召开的明代经济史讨论会上,就提出了研究区域史的主张,指出区域史的研究是国际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区域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过去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中央王朝的兴衰和典章制度方面,很少考虑中央和地方的相互作用。其实各区域因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与中央王朝空间距离及交通难易的不同、传统与风俗的不同、地理物产与民族构成的不同等等因素,它们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和变异程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

新的高度。此外,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2. 徽州学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徽州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是我们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极好范本。从经济角度看,徽州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透过徽商看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商业资本与社会转型的关系,这是其他区域社会难以见到的。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传承了唐宋后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实态。透过徽州宗族组织、家谱、宗祠、族田、佃仆等看中国宗法社会,这也是其他区域社会难以见到的。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即是徽州籍人。透过新安理学看宋代以后理学对正统儒学的传承、徽商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以及商人心态,更是其他区域社会所见不到的。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新安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宗族文化是新安理学的核心。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坚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

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它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仕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可以说在全国众多的区域社会中,很难找到如同徽州的考察传统社会的范本。

3. 徽州保存着异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的资料,这是徽州学得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所在,也是徽州学的价值所在。由于徽州区域社会的封闭性,历史上鲜受兵燹,故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古迹文物遗存)得以保存至今。宗族制度的盛行,不仅使徽州有着林立的祠堂、牌坊、义庄,而且还保存下大量的族谱;科举的兴盛、文风的昌炽,使徽州保存了众多的书院、文庙,还留下大量的文人笔记、文集、戏本、弹词、碑刻;商业的隆兴、经济的发达,使徽州偏僻的乡村也可见到明清精美的建筑和园林;同时经济活动的复杂和社会生活的丰富更是留下难以计数的契约文书档案资料。1985年,笔者参与编纂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是有关徽州学的第一本资料集。1988年,安徽省博物馆编纂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纂的该丛编的第2辑也由同一出版社推出。1991年,徽州文契整理组编纂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目前出版的徽州资料已蔚为大观,然而这仍是徽州文献资料的冰山一角。徽州文献资料的数量已远超过敦煌,而且从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来说,也比以佛经为主的敦煌资料广泛得多。徽州文献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尤其是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实态的重要资料。随着徽州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州文献资料将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也可望有更多的珍贵资料得以整理出版。

徽州学的研究内容：

徽州学是以徽州区域社会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徽州学研究的范畴。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徽商、徽州土地制度、佃仆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方言、徽州文献、教育科举、小说弹词、科技（天文历法、珠算、医学等）出版、戏剧、徽派民居园林、徽州三雕、文房四宝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社会阶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近年来徽州学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拓展，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徽州学虽是以徽州区域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它的研究视野决不能局限于徽州本土一府六县范围。徽州学覆盖的地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胡适先生曾提出小绩溪与大绩溪的概念，指出编纂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套一句胡先生的话来说，徽州学若无大徽州，徽州学也难成局面。徽州学覆盖面之大是与徽商遍天下相关的，徽商便是这种文化辐射的载体。他们将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带到各地。举例来说，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戏剧更是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徽剧日渐成熟。徽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蓄养家班。家班演戏是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贵、洽谈商业的交际手段。徽班之兴起得力于徽商的财力，并随徽商而传播四方。徽班进京成为戏曲界的一件大事，由徽剧发展而成的京剧，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又如，饮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扬州所发展出来的维

扬菜,就占了中国八大菜系的1/4。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会馆、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国各地城镇到处可见徽派建筑。当然徽商带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徽商的商业道德、徽商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徽州文房四宝名闻全国。淳熙《新安志》载:“昔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歙砚、徽墨、宣纸为文人墨客所珍爱,它们也为古代墨宝丹青的传承、为中华文化的昌盛立下不朽的功绩。徽州刻书业在明清曾大放异彩,“徽本”享有很高声誉。徽商除斥资刻印族谱、经书外,还刻印了大量通俗小说和戏剧本子,为市民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贡献。从朱熹、戴震、胡适到陶行知,从理学、反理学到科学民主,徽州文人影响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走势。文化辐射自然是双向的。大徽州对小徽州的影响同样极大。徽州原为山越所居,自两汉以来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纷纷进入徽州,原居民与移民间经过长期的文化整合,到宋代形成了糅合汉、越文化的新安文化。新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理学也是对中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徽州的宗族制度同样是中原土族带来的,这一因战乱而在中原消失了的宗族组织原生态在徽州长期保存了下来。可以说,如果没有宗族血缘的强大凝聚力,也就不会造成强大的徽州商帮。明清数百年间徽商将巨额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小徽州,为造就徽州今天的人文景观提供了物质基础。徽派建筑本身就吸收了江南民居的诸多特征,著名的三雕艺术题材大多是徽商侨居地如苏杭的风物景致。可见大徽州是徽州学研究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小徽州与大徽州的关系也告诉我们,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必须把区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透过区域社会的窗口去深入认识传统中国。

徽州学的研究方法:

徽州学是一门研究徽州社会整体的综合性学科,徽州学的研究必须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这里我想结合自己在徽州学研究中曾

经使用的方法,综合介绍如下:

1. 徽州学资料的搜集。区域社会整体研究与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为二者研究对象的不同,也表现为所用资料的不同。区域整体研究的资料在我们所熟悉的正史中往往所见不多,需要另辟蹊径去广为搜求。为了重现区域全面的历史,我们需要区域全面的资料,包括书面的、口述的、实物的等等。这里仅就专题资料和民间资料的搜集略作介绍。

专题资料的搜集,我们以徽商资料的搜集为例加以说明。徽商研究最大的困难便在于资料的匮乏。自古以来,商为四民之末,在传统史学领域里,商贾市井之辈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有关商人的零星资讯,分散在族谱、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碑刻、文书、档案之中。族谱、方志中的资料分散开来看不易发现它的价值,集中起来分类排比,就能看出问题来。族谱中的人物志、家传、寿序、行述、行状、圻志、墓志铭,方志中的风俗、人物类下的义行、孝友、乡善、尚义、笃行、儒行、宦行、文行、质行等都收有商人的传记。省府县志外,乡镇志的记载往往更为翔实,如《岩镇志草》、《丰南志》、《沙溪集略》、《澄阳散志》等。一些文集中商人的传记或资讯也较为集中,如汪道昆的《太函集》、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许国的《许文穆公集》、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明清笔记小说如三言二拍、《型世言》、《儒林外史》、《古今小说》中有不少徽商的故事,当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80年代初,我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决定从徽商专题入手,做基础的资料工作。我们南下北上,冒寒暑、舍昼夜,到徽州及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搜集资料。当时条件有限,资料全凭手抄。虽谈不上风餐露宿,但住的是简易旅舍,吃的是冷饭冷菜。经过数年的努力,抄得近百万字资料,并从中摘出40万字,编纂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于1985年出版。该资料集将徽商资料分为七个类别: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

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每一类别再加细分,如徽商资本的出路下又分为:购置土地、助修祠堂书院、助饷助赈、兴水利筑道路、抚孤恤贫等义举、奢侈性消费、投资产业。无须多加一字,读者从集中起来的徽商资料便可窥得徽商的概貌。这是第一本有关徽州的专题资料集,它为徽商乃至徽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安徽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在搜集资料的同时,一批徽商研究的论文问世了。

民间资料的搜集以徽州方氏的调查为例。徽州方氏是我宗族研究中重点解剖的一个宗族,我曾到徽州各县以及浙江淳安等地进行过实地民间资料的调查,访得乡民家藏的方氏族谱数十种以及祭祀簿等珍贵资料。说起这次调查的缘由也十分有意思。作为徽州望族的方氏从未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引起人们注意的倒是方氏的一个叛逆者——北宋末年的方腊。在建国后的农民战争研究热潮中,方腊起义也是热门话题之一。重提方腊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1975年,毛泽东就《水浒》发表谈话,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一时方腊名声大振,成为坚持革命的典范。但方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居然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认定为是出身于“家有漆林之饶”的“中产之家”,“又为里胥”,这样的阶级根源,又怎能与坚定的农民革命立场相联系呢?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有必要为其正名。于是地处皖南的安徽师范大学便把为方腊正名的使命担当了起来。不仅要搞清方腊的出身,还要搞清他的籍贯。方腊究竟是皖南人还是浙江人?这也不是小问题,在那个时代,农民起义领袖便是乡贤,一方的光荣自然不能轻易让人。要搞清方腊的身世,最有说服力的资料当推方氏族谱了。1976年,该校历史系组织数十名师生,经历数月时间,在地方

政府的支持下,到方氏聚居的歙县、淳安等地乡村搜集方氏族谱,并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撰写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还于1980年出版了《方腊起义研究》一书。今天看来,关于方腊身世之争已是过眼烟云,孰是孰非,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心平气和地加以考证,重要的是当年开展的关于方腊家世的调查和对于方氏族谱的搜集,为今天的民间资料的搜集提供了线索。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服务期间与学术前辈万绳楠、杨国宜两位教授结为忘年交。他们均是当年方腊的调查者。承他们不弃,向我提供了当年借调方氏族谱的记录,其中有族谱收藏者的地址和谱名,共计54部。重提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民间资料的搜集并非易事,是要花大力气的。即使是对一个家族的调查,靠个人的力量也是困难的。但是深入下去,由此及彼,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古祠残壁下的一块断碑,山村野老的一席口谈,或许能帮你解除旧的疑惑,带来新的思维,从而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实态。我所撰写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便是在民间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2. 区域历史地理、人口的考察,是区域整体研究的基础工程。徽州学的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而要利用这些资料却有着巨大的障碍。无论是族谱还是契约文书等民间资料,在使用时必须弄清它们的地望,以确定其空间位置。民间资料上的地望一般是县以下的,其中最关键的是都和村两级。历史地图只绘制到县一级,那么明清县以下的都的辖区是怎样的呢?村一级的地望在明清数百年间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村名的变迁又是怎样的呢?只有弄清都的分界,以及都所辖村名的变迁,才能根据族谱的地望来确定一个家族的地理位置,并进而查找出相邻几个家族的谱谍和文书等资料,对之作综合的社区研究。1987年,我和一位以徽学研究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者 Keith Hazelton(中文名字贺杰)合作研究徽州的地理、人口。根据明代《新安名族志》(1551年)、康熙《徽州府志》(1690年)、道光《徽州府志》(1827年)

所列村名,对歙县(该县统计增加了1937年的民国《歙县志》)37都1134个村、休宁33都524个村、绩溪15都439个村的消长衍变作了全面的考索,分别制作了85张《近四百年某都村名考索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精心绘制了三县的分都图,计算出了每一都的面积,并借助电脑绘制出《徽郡三邑人口相对密度分布图》和《徽郡三邑名族密度分布图》。都一级的人口与名族密度及村庄的变迁,对于历史人口学、地理学来说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史来说却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畴。我们合作的成果《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提交给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并于1989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时因篇幅所限,图表均未刊出,这次借结集之机,将其中部分图表刊出,以供参考。

3. 徽州学研究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注意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切忌就局部而局部,以免使研究变得琐碎、零乱。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相对的,区域与中国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缩小一些,区域与一县、一都、一村、一族、一人间的关系也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放大一些,中国与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区域研究必须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座标上去,在纵向的时间与横向的空间座标中找到它的位置。小至一人、一村、一族,我们总要看到它在一县、一区、一国的时空位置。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有必要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例如在《论明代徽州海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我在对徽州海商的研究时,便是将这一行业的商人(局部)放在整体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纵向时间以及与世界市场、海外贸易相联系的横向空间座标上加以考察的,从而得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国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的结论。我们通常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16世纪,为什么呢?一般都将其

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生产力早在宋代就已经成熟了,明代的改进只是量上的,并未脱离中世纪水平,远不足以动摇封建的经济结构。由于结构未变,国内市场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知道,只有市场发展了,生产规模才会扩大;生产规模扩大了,生产的组织方式才会改变,新的生产方式才会萌芽。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应该注意 16 世纪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中国海商的走私贸易。正是徽州海商和其他海商的走私贸易冲破了明王朝的海禁,把江南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从而造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世界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恰恰是江南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部门的产品。嘉靖、隆庆年间,在江浙沿海最大的走私商帮正是徽商。而徽商之所以能在走私贸易中一度执得牛耳,是与徽州商帮强固的血缘、地缘纽带分不开的。“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坐贾、手工作坊主,“遍天下”的行商,铤而走险的海商之间形成一个从生产到流通的海外贸易网络。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徽商功不可没。1990 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发表该文时加了编者按:“这篇文章(指陈春声、刘志伟的《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和下一篇文章(指拙文)围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文章涉及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与性质的估计,牵涉对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流通、内因与外因、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应该讨论的,欢迎大家对此发表意见。”按语所云的三个关系,实际上都涉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又如我对徽州望族——方氏的研究,也是把它放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的。方氏是西汉末年因王莽之乱率先迁入徽州的中原望族。我根据多部方氏族谱、新安名族志以及方志、笔记等珍贵地方史料对近 2 000 年来徽州方氏之源流、迁徙、分合、演变作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动态与静态相结

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方氏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传统社会变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全文环绕这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方氏以“变”应“变”,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从汉末方氏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经济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荣之区。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其二,相对静态的徽州农村宗族社会。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南宋后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当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宗族还有以“静”制“乱”的功能,北宋末徽州方氏柘田派族人方腊的起义是从打击宗族势力开始的,也是在宗族势力的打击下结束的。此后方氏迅速重建宗族统治,恢复徽州农村静态的生存状态。其三,16世纪初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方氏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以农村到城镇为主;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形成大宗族—小家庭的格局。上述三个方面的对应关系,文章勾画了近2 000年来方氏宗族和徽州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并从时空坐标上找到了徽州的位置:徽州虽然是一个崇山环绕近于封闭的区域,但是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反响。徽州与其他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始终保持着本区域的稳

定。

再如,徽州人物——胡适的研究,同样体现着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胡传、胡适父子及其家族的历史,是徽州区域整体社会的缩影(举凡徽州宗族、徽商、新安文化等均有综合的体现),显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脉络。因此,研究胡适的意义,决不是限于一人一家而已,它已被赋予整体史的意义。

4. 跨学科的方法。徽州学是一门研究区域整体史的学科,对它的研究必须摆脱传统史学陈旧观念的束缚,必须从孤立的、封闭的研究转向综合的、开放的、跨学科的研究。诸如人口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凡是能运用的方法都应拿来为我们的研究服务。当然在具体运用时,应根据对象的不同,选用适当的方法。

例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王毓铨先生在读了我提交给首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后,于1985年11月3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徽商与宗族一文,既可说的本题,也具有启发性。明清徽商的行径亦可于近代华侨中见之。盖远离乡土欲立足异乡异国者,必赖互助而后始能遂其生固其业。互助之纽带多种,宗族联系最为有力。美国之有‘中国城’——‘唐人街’,而唐人街中至今尚保存其祖宗堂号组织,如致公堂等,各堂相结,而自治政事于是生焉。曩在美国为大使时,胡适曾于1939年在东方学会一年会上宣读论文一篇,言民族文化之传播如池水然。投一石子于其中,则波纹逐圈外传,故往往于其边缘处发现其原始中心文化教育之特点。尊论亦为佐证。”群山环抱之中的徽州容纳着、积淀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区域已经消失了的种种符号,因此对徽州作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能帮助我们解读这些符号,做到重构历史。

又如计量史学的方法。《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运用徽州家谱所提供的明末清代家庭、人口资料进行数量统计。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的。同时,宗族却在扩大化,徽州各地纷纷出现联宗现象。统计数字还告诉我们:徽商对徽州小家庭一大宗族结构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徽州人“大半以贾代耕”,疏散了人口,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徽商因其商业合作的需要,不断给宗族血缘纽带输送营养,加固并扩大血缘群体。反之,这一构成又反作用于徽州的社会经济,使徽州的社会结构富于弹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徽州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造成儒家学说的昌盛;强化了对佃仆和妇女的压迫,从而维护了商人家庭的稳定。

再如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明清徽商心理研究》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徽商心理的整合,揭示其基本的心理特征,探讨商帮心理与商业的关系。徽商心理的整合与徽州商帮的形成是同步的,大约始于明代正德末、嘉靖初,完成于嘉靖末之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的标志。徽商心理整合的核心是价值观的整合。徽商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徽州社会所容纳和接受。徽商处世谋利的行为方式是受其特有的群体心理所制约的。徽州商人虽然因其出身、学识、专业、财富、地位不同而在个性上有着种种差异,但是在他们的个性中却寄寓着心理的共性——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以至于我们只要根据他们对“功名”的执着追求、贾儒两种“功名”“迭相为用”、血缘与地缘的紧密结合、“以众帮众”排斥异己等行为方式,便可以轻易地把他们与其他商人区别开来。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是适当的方法,在具体运用时,也不能机械地套用,而要把一般的方法加以改造,做到融会贯通,使之